



解方：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参谋长



解方原名解如川，字沛然，是新中国首批授衔的少将。抗美援朝期间，解方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首任参谋长，参与多次重大战役的指挥，并参加朝鲜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 石绍庆
据《学习时报》



解方(左)在朝鲜战场

毛泽东：你的名字就改为“解方”好了

解方早年参加东北军，193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党在东北军的工作。1936年，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当天，解方与东北军刘忠干等爱国将领，在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发动了响应西安的兰州事变。他指挥部队包围绥靖公署及特务组织，稳定了兰州局势，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威，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随后，解方被派往广西，联络抗日事宜。1937年初，解方回到西安，向周恩来汇报了广西的情况。周恩来赞扬他为促进联合抗日所作的努力，并要求他把东北人民、东北军、东北救亡团体团结起来，扩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解方被派往第五战区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和群众工作。徐州会战后，解方随部队到达鲁南，在东北军中积极开展党的工作。1940年夏，党在东北军第51军工作委员会遭到破坏，解方被迫撤离山东，前往延安。

1941年6月，解方到达延安，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解方等人。毛泽东诙谐地对解方说：“‘解(jiě)放(fàng)’同志，你们已经回到家里来了。你的名字就改为‘解(xiè)方(fāng)’好了，不要再‘解放’了。”自此以后，“解方”成为他的正式名字。

彭德怀：解方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开赴鸭绿江边，任命解方为第十三兵团参谋长。1950年8月，解方到达前线后，便立即前往司令部作战室，听取作战参谋汇报敌我状况，对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短短一个月内，解方迅速熟悉掌握了所属部队基本情况，详细考察鸭绿江沿岸的地形地貌，研究战场敌我态势。他还科学判断，将来进行作战的特点是现代作战、山地战，并得到了实践证明。

1950年8月31日，解方起草了以邓华、洪学智、解方三人署名关于边防军作战准备问题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的高度重视和肯定。10月，东北边防军改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方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

作为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经常夜以继日地与志愿军司令部有关部门进行作战研究，就如何有效贯彻志愿军作战意图提出富有见地的建议。志愿军司

令员彭德怀在筹划战役、调整部署时，经常说：“叫诸葛亮来谈谈情况。”彭德怀口中的“诸葛亮”指的就是解方。入朝作战以来，解方一直伴随彭德怀左右，以他超常的记忆、敏捷的思维、深邃的谋略和出色的工作，得到彭德怀的信任和器重。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干部曾回忆，彭德怀非常严厉、爱“训人”，但从未听到彭德怀批评过解方。曾经有一位同志说解方是“旧军人”出身，彭德怀一听火冒三丈，严肃地说：旧军人出身怎么啦？我看解方是个好同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彭德怀专门派解方回国，向毛泽东汇报朝鲜战场情况。1951年5月27日，毛泽东约见解方，听取解方汇报朝鲜战场情况。在这次会见谈话中，毛泽东把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形象比喻为“零敲牛皮糖”。从此，“零敲牛皮糖”作为志愿军在防御作战中打小歼灭战的专用名词，成为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正确方针。

解方：谈判桌上就是一点事也不能让步

1951年7月3日，毛泽东就举行和谈会议，专门嘱咐彭德怀“命令解方及部队首长加速布置开城地区的开会地址等事宜，务须保障双方联络员及双方代表的安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建议解方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之一，迅速投入到会议筹备工作中，对谈判会场地的选择、布置、警戒等，均事先做好准备。7月8日，解方参加了为筹备朝鲜停战会议在开城近郊召开的联络员会议。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正式开始。谈判甫一开始，即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美方不仅在谈判中采取故意拖延态度和非正义偷袭行为，还悍然发动夏季和秋季攻势，造成谈判中断。

1951年10月，朝鲜停战谈判再次开启。11月下旬，谈判在停战保障协议上再次陷入僵局，其中一项大分歧是关于轮换军队和补充武器问题。美方要求有权轮换军队，我方同意了个建议，并主张应把轮换的人数限为每月5000人。但美方认为这个数目不够，要求有权把旧武器换成新武器，用满装的弹药箱来换掉空弹药箱，并要求对朝鲜北部的军事设施加以限制。解方认为这是无理干涉朝鲜内政，明确告诉美方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并表明我方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我方坚决认为停战期间我方在朝鲜境内处理某种设备的权利绝不容你方过问。我方的领空绝不容许任何人进行侦察。”

1952年1月，朝鲜停战谈判第三项议程小组委员会再次召开，解方系统阐述了美方各种论点的虚伪和空洞，驳斥美方支持所谓“限制机场修复与兴筑”的无理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以及美方在战场上已感确无胜算，美方不得不同意我方提出的公平合理主张，停战保障问题最终达成协议。

解方在朝鲜停战谈判期间，始终坚持公平合理原则，以极大的耐心推动谈判，有理有据与美方开展斗争，促使朝鲜停战谈判取得胜利。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晚年，在回忆朝鲜停战谈判这段历史时，解方说道：“谈判桌上就是一点事也不能让步，这是斗争，输一局都不行。”



抗战期间，李可染与郭沫若比邻而居。在住房的附近有一个牛棚，一头青色的大水牛每日早出晚归。渐渐地，两人都对这头水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郭沫若为此创作了著名的长诗《水牛赞》，李可染也拿起画笔，从那时起开始着迷画水牛。

为了画好牛，他就潜心观察这头水牛如何吃

李可染以“牛”为师

草、啃蹄、喝水、反刍。由于川东地区的民房都是串夹壁，隔音效果很差，每到夜深人静，隔壁水牛的气息彻夜不停地传入，让辗转反侧的李可染产生无限冥想。水牛埋头苦干、无多需求的形象感染着画家，他忽觉得牛的品性轩宏无华，可爱无比。

他非常喜欢牛，喜欢牛的性格，钦佩牛的精神，因为他小时候有和牛一起生活的经历，又受鲁迅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影响，他画了很多水墨牛图，并以牛自比，就连自己的画室也命名为“师牛堂”。

他画的《放风筝》《暮韵图》中，牧童的淘气和可爱，水牛神情怡然，朴实憨厚，异趣横生，寥寥几笔一幅牧牛图就跃然纸上，大有多一笔就显得多余，少一笔就显得不够的感觉，恰到好处，彰显笔墨功力。从李可染牧牛图我们不难看出他是一位童心未泯的画家，牧童与牛的情趣使他的灵魂得到净化、生命得到升华。

“文革”期间，李可染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罪名，下放到湖北丹江口“五七”干校进行改造。对这段历史，李可染很少提及，只是偶尔自嘲说：黄胄画驴我画牛，他是“驴贩子”，我是“牛贩子”，我不如他出名。 ■ 沈治鹏 据《人民政协报》